

关于人才成长的社会土壤的思考

——“北京市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成长状况”课题研究报告

郝红专 张环

本文是在数据分析报告、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课题研究报告。文章力图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审视知识分子问题,透过对研究对象科研状况及成才背景的分析,进而对人才成长、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土壤进行宏观的理性思考。文章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面临的一次巨大的时代变革,它向人才发出了强烈的呼唤,然而在原有的社会环境中,人才的生长不尽如人意;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人才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格格不入,其要害在于它不是以人才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价值来衡量人才和对待人才的;冲破旧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是它的必然结果;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应在机制上更大程度地体现社会发展对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要求,使几大社会系统形成更为协调、有效的社会互动。

执笔人:郝红专,男,1958年生,北京组织人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环,女,1952年生,北京组织人事研究所副所长。

根据北京市科委的软科学研究项目计划,我们对北京市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成长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获北京市委、市政府命名的“1991年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者和因学术成就比较突出而被破格晋升高级职称者,(个别人兼有双重身份)他们的年龄均在30—45岁之间。

课题组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这批有着特殊经历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科研工作现状、发展潜力和成才环境因素的分析,进而对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土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时代的呼唤、社会实践的需要,是人才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个人的天资和品质固然在人的成长、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人的成长、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需要;反过来,人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着实践的深化和社会时代的进步。这是人才成长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辩证法。

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出生在建国初期到60年代初期的10年间,两次巨大的时代裂变,一条宽深的知识与人才断层,就是这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社会大背景。

第一次时代裂变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生活被政治的狂风暴雨所席卷，政治斗争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抓经济被视为搞资本主义，搞科技被说成走白专道路，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愈穷愈光荣，愈无知愈纯洁，愈“左”愈革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其严重的挫折。与其说这是一次社会震荡和裂变，毋宁说是对知识尊严和人类文明的空前洗劫和野蛮践踏，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大灾难。

第二次时代裂变从1978年开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打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经受严峻考验而更加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清醒地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鲜明地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并进而做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我们的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一条宽深的知识与人才断层，是指“文革”十年科学技术创造受到抑制和这一代青年成长受到摧残，使全国范围的人才结构出现一个断层面。它给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带来的决不仅是十年的科技荒漠和“科学春天”的迟到，它对我国的科技振兴、社会发展及对民族精神和思想观念的危害还将波及很长时间。

社会大变革和生产大发展时期往往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期。欧洲文艺复兴即是从中世纪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变革年代。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和这个伟大时代对人才成长的促进作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那时，一大批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脱颖而出。我国的春秋战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发展变革时期，都曾出现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才辈出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中出现的两次时代裂变，同样对一代优秀人才的涌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人才的成长过程划分为内在素质的积蓄阶段、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质变阶段和成果的社会承认三个阶段的话，这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素质的积蓄阶段正处于“文革”时期。“文革”中，大批知识青年被迫中断了本应正常进行的学校教育，下到农村和社会其它最基层单位接受工农的“再教育”。但是，“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经历，也确实使这一代青年人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这表现在：第一，这种经历虽然使他们失去了继续接受在校教育的机会，但却使他们以一种非常的方式获得了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第二，艰苦生活的磨炼和被迫中断学习的痛苦，塑造了他们的意志和品格，而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品格正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内在因素；第三，作为同龄人中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和强烈的求知欲，在极“左”精神压制下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弹力，使他们过早地思考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政治问题，产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为他们日后抓住机遇走上成才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内在素质积蓄，主要是在生活经验和精神品质方面。

这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质变阶段和成果的社会承认阶段主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几年。这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改革年代，为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第一，强烈的时代反差，使人才能量的释放受到极大的激发。这代青年在最美好的年华曾被野蛮地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力。然而痛苦可以变成财富，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这批人中的优秀者或者带着伤痕和雄心走进高等学府，或者克服工作和生活中极大的困难在业余时间参加各级各类学校的学习，在自己原有的文化、专业起点上追求知识的学习和工作技能的提高。他们以超常的努力夺回失去的青春，弥补知识的不足，他们对真理和知识的向往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如饥似渴。这是许多没有经历过美好的青春被荒芜、追求科学的热情被压抑的青年人所难以理解的。

第二，思想解放运动打破精神枷锁，使人才的创造力得以猛烈地迸发。这批人在青少年时代都曾沉浸在宗教狂般的造神运动之中，也都体验过被愚弄之后的痛苦；都曾充满过对科学、真理、人生的美好憧憬，也都感受过精神桎梏带来的压抑。1978年开始的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许多思想禁区，各种学术思想、观点、见解在社会上广泛交流、辩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代青年中的优秀者，不仅从中获得了知识的营养，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激活了思想、启迪了智慧并激发了巨大的成就欲和创造力。仅仅十几年时间，他们就以丰硕的科研创造成果，填补了“文革”十年知识断层造成的许多空白。

第三，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为人才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恩格斯曾这样写道：“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的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科技振兴在经济发展中处于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代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要求，在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使自己早出成果，迅速成才。

第四，现代人才的大量涌现和高质量的发展，与大规模社会信息流的形成密切相关。当我们从极端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走出来的时候，世界已进入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称的“信息革命时代”。全方位的开放，使我们从未象今天这样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从未象今天这样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未象今天这样多地搜集、吸收和利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信息。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发展。信息对科技发展的作用是如此，对科技人才成长的作用也是如此。

二

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与人才成长的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但研究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成长，就应对他们的经历、品质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

前面谈到的是这一代人在成长的关键阶段所处的社会时代以及社会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是什么因素使他们成为处于同一社会背景的一代青年人中的优秀分子？这批人在当代科技领域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不妨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的主观条件和科研能力及水平。

人才成长除了需要社会大环境提供成才的必要条件之外，天资和心理品格、思想品德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自身内在因素是又一方面的重要条件。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主要表现在他们能够比同时代人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更加善于捕捉机遇、把握命运,具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和智慧的人生选择与人生设计,并且把这种人生选择和人生设计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使自己的个人价值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使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得到社会的承认。

——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较高的抱负水平。这是人才成长最基本的内在因素。在研究对象“最敬仰的知名人物”中,除了革命领袖之外,较多的是钱学森、鲁迅、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他们把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文学家作为人生的楷模,将顺应时代潮流、在社会实践中有所奉献并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作为最高人生追求。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这是一种严肃负责的人生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科研素质。他们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时代,又在伟大的实践中获得实现这种责任感的满足。他们明确地认识到: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前途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才能谈到个人的发展,个人的价值才能被祖国和人民承认。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这批人多数自幼培育了良好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绝大部分人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参加工作以后,他们具有强烈的知识更新的欲望,并且,更新取向集中在本学科最新科研成果和获取、整理、研究本学科学术资料的工具型知识。在具体的科研工作中,最愿“承担最具挑战性的课题项目”,注重在实践中提高科研水平,在攻关中取得成果。

——具有坚定的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在实践中,他们备尝被夺去学习机会的痛苦和缺乏知识难以施展才华的苦闷,在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抓住机遇考入大学或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顽强地把知识运用于实践。

良好的天资和心理素质、思想品德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批人大都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影响。这种自幼生长的环境影响较之社会大环境和学校教育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的品格、意志、情感等方面的心理素质的影响。高文化水平家庭出身的研究对象,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和工作性质给家庭造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使自己耳濡目染,从小就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另外父母对他们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他们能直接在父辈那里得到学业的指导。低文化水平家庭出身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从父辈的勤劳、善良、纯朴等品格中受到感染,从较为艰苦的生活中受到磨炼,立志为改变家乡面貌而努力,至少要报答父母,他们的父母则往往教育子女,要为人正直、好好读书,立志成才。

学校教育是为人知识增长及事业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环境因素。我们对研究对象所就读的学校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他们自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在重点学校就读的人数比例依次升高,也就是说,愈接近成才,在重点学校就读的人数比例愈高;其二,非重点学校同样可以出人才,这是由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别的相对性和个人成才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研究对象中不少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较之由校门进校门的一般青年学生,他们更加珍惜重新进入学校的学习机会,学习的自觉性更强;他们已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并将这种经验渗透于他们的学习目的之中;他们在校社会工作能力较强,参加工作后,适应社会环境的时间相对较短。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大多数来自应用科研、生产的第一线，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来自工商企业或农业生产一线，他们的工作最直接地与生产技术的需要相联系，他们的成就也直接地转化为应用技术，这种科研成果和应用技术不断地被社会承认，又不断地使他们获得新的创造动力。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在践踏科学、蔑视知识的社会土壤中度过人成长的关键阶段的，他们毕竟在本应打下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的自身素质的积蓄阶段耽误了。就这个群体的整体看，由于他们受教育方式的特点，已显示出理论基础不扎实、知识体系不完整的劣势，不能不说，这种状态使他们缺乏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后劲。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表现出的“人才断层”现象和这一代人的成才分布说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变革了的时代已经为造就人才辈出的局面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然而，土壤仅仅是土壤，种子的发育有其自有的规律性。就一个群体来说，他们可以用超常的奋斗弥补时代带给他们的缺憾，但他们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先天不足”的痕迹。

三

现在考察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才规律，决不仅仅是为了记述他们与命运搏击、与社会抗争的悲壮成才历史；也不仅仅是为了以史为鉴，对有关政策进行局部的调整或二三改动。强烈而急迫的社会时代对知识和人才的再次呼唤，潜在的科技人才断层可能会重新出现的现实威胁，使我们必须对人才成长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认真进行历史回顾，深入进行理性研究与思考，从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树立全新的人才观念，从根本上翻新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土壤。

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次巨大的时代裂变。就其性质来说，这次变革是第二次时代裂变的继续和延伸，但就其对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深刻性、根本性而言，比过去的变革要剧烈得多、深刻得多。它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目标模式，将根本改变人与社会、新模式与旧体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宏观关系，因而也就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换脑筋”，要求产生一代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的优秀人才。

养士爱才、九品八股、论资排辈、鄙商薄技等等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人才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格格不入，要害在于它不是以人才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价值来衡量人才和对待人才的。即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代表时代精神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如果在传统观念的框框内理解，在传统的知识分子管理体制下“落实”，也还是不能跳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套路。^①

我们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知识分子问题，首先，科学技术是对自然、社会的内部固有的规律性的揭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任何外在力量强加给自然和社会的。其次，知识分子是具有较多的专门知识并以专门知识深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和能动的要素

^① 50年代，党基于我国当时的社会情况，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的。遗憾的是，这以后，我们的一些干部不顾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成分的根本变化，将“团结、教育、改造”固化为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观念。

——劳动者——中对生产对象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较强的一部分人。这部分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或者更高，绝不是相反。而这种“平等”或者“更高”是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来体现和衡量的，并应通过社会市场来予以确认。我们应当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更新人才观念，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制定知识分子政策。

在科技发展中，科技工作的直接承担者——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发挥是关键环节。无疑，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是激发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措施，但是，如果仅限于在这个层面做工作，则会失之肤浅。其一，“知识分子”的界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如果以学历划分，浓厚的“科举”味道估且不谈，大量的自学成才者和应用技术的发明创造者如何对待？如果以工作性质划分，就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我国现阶段，科研机构设置的结构不尽合理，科研与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相脱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学非所用或用非所长。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不会在本来的意义上解决好待遇问题，还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其二，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正在改革之中，各方面的关系远未理顺。如果一般地研究解决知识分子的工资、住房等待遇问题，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在全社会的地位问题，并且国家为提高知识分子工资等投入是不会追上现阶段社会其他行业人员实际收入增长的。几经反复，就会使“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变为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的几起几落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制订知识分子政策，我们认为，应在更大的范围内培育有利于科技进步和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土壤，在机制上更大程度地体现社会发展对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要求，使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人才成长几大社会系统形成更为协调、更为有效的社会互动。也就是说，使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待遇等等在实践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鼓励科技含量高（物质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的产品，鼓励以科技进步为前提和动力的效益，促进科研和社会实践需要的有机结合。科学研究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如基础理论、尖端技术、应用科研、技术推广、技改革新等等，不同层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成果实现形式、出成果周期是不同的。应将科技视为商品，逐步由市场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科技产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科研工作者以成果和贡献论待遇。当然，不应对科技市场做庸俗的、狭隘的理解，由于科学的性质，不应简单地以眼前使用价值对其论价。如果忽视这一点，不仅会使科学系统支离破碎，而且，“为经济建设服务”也将无从谈起。因为市场具有短视的一面，而科学具有系统的一面。国家对基础理论建设、文化建设的相应扶持和投入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大力提倡人才自由流动，促进人才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配置市场化，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尤其应当尽快地市场化。人才成长在本质上讲是一个自觉能动的实践过程，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根本特点。因而，与社会物质资源配置相比较，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更应发挥人才的自觉性。在一个地区、单位、岗位算不得人才的，在另一个地区、单位、岗位就可能成为人才。人才流动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才升值，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效益。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人才可以在流动中找到最适合自己发挥作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位置；二是用人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实际用人需要，选择、培训人才，这

种作法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刺激用人单位珍惜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从而优化配置本单位的人才结构；三是通过上述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促进全社会的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犹如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可以自发地、比较自然地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困扰我们的自然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如此看来，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走向‘新’、‘西’、‘兰’”，它的人才效益都会在流动中显示出来。当然在两种体制转换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全部市场化的艰难性、长期性，也应有足够的准备，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

第三，与此相适应，应适当调整现行人才管理部门的职能、工作方式和工作重点，应强化人才管理部门对人才所实行的宏观预测、规划和评估、仲裁。顺便谈一点，我们对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职称评定工作中的论资排辈、重资历轻贡献、重学历轻能力和计划统得过死等习惯作法实行改革是必要的，但切不可为此而弱化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社会化评审系统的职能。

第四，真正舍得下大气力、花大投资抓好教育事业和国家重点科研单位的建设。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是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它要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被社会生产实践需要所决定的一面，同时也有它在各自的领域内相对独立地探寻真理的一面。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唯一途径，国家重点科研单位是全社会科技进步的支柱。没有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的科技进步就不会建立在一个高起点上；没有国家重点建设的科学研究机构作为支柱，社会的科技进步就会缺乏长远发展的后劲。将诸多的科研门类和大量的知识分子推向市场以后，国家卸掉了“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大包袱”，会为抓好教育事业和重点科研单位的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第五，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有利于解放思想、启迪智慧，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及。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中出现迷信或科学家抵制科学发现的事情在科学史上也曾出现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利于打破科学研究中的迷信，鼓励人才的创造性思维，促进人才的成长，从而推进科技的进步。

如果把一个时代人才的产生和涌现看作一段历史过程，那么，以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代表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是一代人才涌现的先驱和突围者，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呼唤出一代代人才大军滚滚而来。

(课题组成员：张环、张清、郝红专、李丽娜、石树仁、郑继孟、王晖)

责任编辑：唐 军